

## 传拓技艺的产生和发展

古籍馆金石组

传拓亦称椎拓，是中国特有的保存文献的传统方法，是用纸、墨和传拓工具从金石器物上捶印其文字和图画的技法。

传拓始于何时，迄今尚无定论。唐代石刻文献中有对“打本”的记载，诗歌中也有对传拓技法的形象描写，可知传拓到了唐代已经非常成熟和普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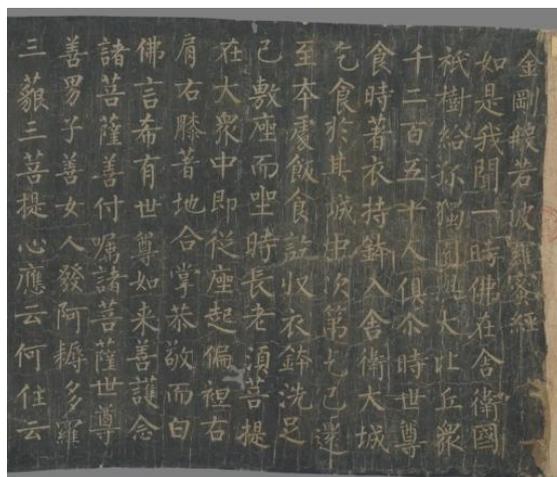
先秦时期的印章和封泥启发了传拓技艺的产生，不同的是印章文字是反的，石刻文字则是正的。东汉经学兴盛，因各家所传经文字各不相同，导致论争纷起，蔡邕

等奏请订正六经文字，于熹平年间（172-178）刻成规模浩大、气势宏伟的石经，是中国最早的儒家刻经，在校对版本、规范文字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东汉时期石刻大量出现，特别是熹平石经被用作官定经本，使复制碑刻内容成为当时强烈的愿望。同时造纸技术，纸张质量提高，成本下降，用纸传拓有了可能。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也是传拓产生的重要条件

之一，近年出土的战国墨书不胜枚数，可见当时墨的使用已经较为普遍。

对石刻文献的复制需要刺激了传拓技艺的产生，在纸张的普及和质量提高、墨的广泛使用等物质条件齐备的前提下，受玺印和封泥使用方法的启发，传拓技术应运而生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了秦刻石和汉魏石经等拓本，其注文记载了汉魏石经毁于北齐神武年间的史实，所载犹在秘府的“相承传拓之本”，当为北齐神武之前拓本，据此，传拓至迟在北齐时期已经产生。

唐代诗人韦应物（737-786）《石鼓歌》中说：“今人濡纸脱其文，既击既扫白黑分。”可见传拓技术发展到了唐代已经较为成熟。王建（767-约



柳公权书《金刚经》唐拓本



石鼓（现藏故宫博物院）



封泥：皇帝印玺

830) 《原上新居》：“古碣凭人拓，闲诗任客吟。”反映出唐代文人对拓碑的过程已经相当熟



李世民书《温泉铭》唐拓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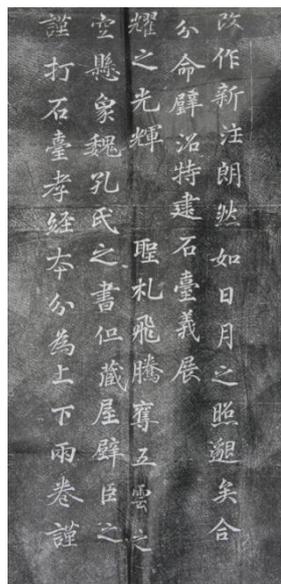
悉，传拓碑刻已经相当普遍。存世最早的拓本为敦煌出土的唐拓太宗李世民书《温泉铭》、柳公权书《金刚经》及欧阳询书《化度寺邕禅师塔铭》。

《温泉铭》原碑立于陕西临潼温泉华清池，石早佚。该铭是唐太宗晚年巡游此地时即兴所作，铭文描述了温泉美景，高度评价温泉功能，感叹“人世有终，芳流无竭”。赵明诚《金石录》曾著录此碑。在我国书法史上，以行书入碑的首创人是唐太宗李世民，他一生尊崇王羲之，深得右军法度，雍容道丽，笔法生动。写此铭时，唐太宗已是晚年，其笔法圆熟流利，浑然天成。

传拓技艺自产生之日起，就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。唐代文献中有对“打本”和“搨本”的记载，其中的“打本”即今天的“拓本”。唐诗中也有对传拓技法的形象描写，可知传拓技法到了唐代已经非常成熟和普及了，存世唐宋拓本多为擦拓，在墨色上，宋代才有“乌金”与“蝉翼”之分，基本技法也有了擦拓与扑拓两种。到了明代，传拓的对象从隋唐碑刻扩大到汉魏六朝碑志等，传拓技法和传拓用纸也有所发展。清代金石学复兴，嘉庆、道光年间出现了青铜器的全形拓法。全形拓需要更加精致和高超的技巧才能完成，是传拓技艺发展的最高境界。



北宋嘉祐五年刻《仓颉庙碑题名》中对“打碑”的记载



唐元和八年刻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中对“打本”的记载